

“趋同论”评析

李明生

前一个时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中,有一种貌似中庸的、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互相学习、相互靠近、差异减少,最后融合为一种最优的社会制度的学术理论观点——“趋同论”。本文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趋同论”进行一些评析和批驳。

一

“趋同论”产生在两种社会制度严重相持的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使得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威胁。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重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如再不对它进行某些局部的调整,就再也不能生存下去了。在这种背景下,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中,就产生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潮。其学术理论上的典型代表,就是两种制度“趋同论”。

“趋同论”在上述时代背景下产生后,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由萌芽状态的学术理论观点,发展成为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最早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提出的,他在书中写道:“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它鼓吹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都趋向于“由公共机关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谁该得到什么东西的那种社会组织。”这就是萌芽状态的“趋同论”思想观点。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巴金汉出版了《理论经济制度:比较分析》一书,书中写道:“正在发生作用的现实经济制度,差别不是越来越大,而是变得越来越小。”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也在《三次世界大

战的原因》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都在向中央的官僚主义社会趋同发展。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把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前后相继的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美国是第一个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高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得不单方面趋近于西方制度模式。1961年,荷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迷贝尔根集熊彼特、索罗金等人思想之大成,发表了著名的《共产主义与自由经济是“趋同”的样板吗?》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趋同理论”的内容,得到一批资产阶级学者的呼应。例如:

在社会学界,提出了“工业社会趋同论”。1962年,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出版了《工业社会十八讲》,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同一类型的两个品种,或者是同一社会类型(即进步工业社会)的两个形式。”1966年,美国的小马里恩·利维出版了《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一书,集中论述了一切工业社会在技术推动下日益变得相象。此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趋同论”、托夫勒的“信息社会趋同论”都发展了这种观点。

在政治学界,提出了“技术行政趋同论”。1965年,美国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提出了技术行政(官僚)趋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A·G迈耶尔在1970年写的《趋同理论》,R·鲍姆在1977年写的《机器的辩证法》等书都发挥了上述思想。

在经济学界,提出了“两种制度经济趋同论”。1967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

出版的《新工业国》中认为，美国经济已经主要表现为计划体系，他写道：“计划体系，是工业国的主要特征。”这样，社会主义和西方的两种经济制度……在计划上趋同了。“苏维埃和西方制度存在着可计量的相同的计划经济发展的趋同”。加尔布雷思还认为：“趋同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现代生产，复杂的技术，特别是作为复杂精密的组织管理而产生的”。

历史进入80年代，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潮流，被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多方论证“趋同论”。于是“趋同论”大为兴盛。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托夫勒。他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写道：“所有制在本质上是第一次浪潮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第二次浪潮”的产物。它们都将在“第三次浪潮”中进入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再存在所有制问题，其特点是生产的小型化、分散化、技术化、多样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等。这样，经过近半个世纪，两种制度“趋同论”就发展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并受到国际资产阶级的青睐，逐渐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入，成为国际资产阶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种思想工具。

二

资产阶级“趋同论”虽然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各自的理论观点，但是，综观其变，其根本要害在于彻底否认唯物史观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兜售资产阶级唯心史观。

第一，资产阶级“趋同论”对社会运动的看法，完全是出自社会运动之外的所谓“理性原则”，从头脑中臆想出来的幻想。

它彻底地否认了社会运动的终极原因，应从社会的内部去找，即应归因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又是最基本的社会物质生活，它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不进行这种生产就谈不上人类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恩格斯早就教导我们要寻找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只能从该社会的内部运动，即从社会生

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矛盾运动中去揭示和寻找社会发展的原因。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它的运动外化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上述二组矛盾激化，就必然导致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仅暴露而且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对抗性：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即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更加尖锐，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从而动摇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为政治危机提供了条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客观地要求消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必然导致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其它劳动群众起来革命，通过暴力革命砸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人民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用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去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变革的原因，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即生产方式中，而这一原因导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代之以起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可是，资产阶级的“趋同论”完全回避和抹煞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性质和水平，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这个内在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把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看成是统治者服从理性原则的结果。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两种制度下的社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扬弃、共同融合的结果。这种从社会运动的外部寻找社会发展原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来就没有变成现实。在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既不属于资本主义，又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所谓优化社会。而我们所看到的倒是国际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在采用各种手段，强化资产阶级

国家机器，企图灭亡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趋同论”的虚假性、欺骗性及其美化资本主义、取消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

第二，资产阶级“趋同论”，抽掉两种制度的阶级属性，彻底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占有生产资料，居于统治和剥削的地位。他们凭借手中的资本无偿地占有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雇佣工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处于被统治和剥削的地位，这种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必然表现为政治上的根本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断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加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能够联合农民和其它劳动群众，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不是从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它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而这种斗争的手段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因此，一切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拒绝一切革命行动，想通过宣传、试验等方法去实现社会变革的幻想，只能是对唯物史观的背叛。

在上述根本问题上，资产阶级“趋同论”彻头彻尾地反对着唯物史观。它有意回避和抹煞两种制度的阶级内容，鼓吹“新阶级合作主义”，企图通过资产阶级同工会及其有关组织进行直接广泛合作的办法，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他们还大力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了“中产阶级”，别有用心地把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的“白领工人”的增加和生活待遇的某些改善，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他们把“白领工人”划入“中产阶级”，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正在消失”，“正在中产阶级化”，而“中产阶级几乎囊括整个

西方社会”。这样，无产阶级消失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熄灭了，社会可以通过“中产阶级化”进入他们所设计的所谓优化社会。这其实是资产阶级“趋同论”者的一派胡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会及其有关组织与资本家的合作，只能使工会及其有关组织变成“寡头政治”的机构，丧失工人阶级的权益。无产阶级的“白领化”是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并没有改变“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处于大体相同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他们丧失生产资料、受雇佣、受剥削的境况。资产阶级“趋同论”者企图通过所谓“无产阶级正在中产阶级化”的谎言，掩盖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个根本事实，只能起到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有觉悟的工人阶级越来越看清资产阶级的欺骗伎俩，为争取本阶级的权益而斗争。当代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罢工运动从未间断，即使在经济发达的美国，从1969年以来，每年都发生三、四万人大罢工，特别是1978年发生的40万汽车工人的大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1979年美国发生工人罢工就有四千多起。但是，无产阶级要求得到解放，还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历史的大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第三，资产阶级“趋同论”，彻底地否认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的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分析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引起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的变革。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据此，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出了胜利的方向。这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

但是，资产阶级“趋同论”者无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他们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革”，诸如实行“经济计划化”、“私有企业国有化”、“经理革命”、“吸收工人参加经济管理”、“实行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措施。由此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人民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已经兼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成为他们设计的“最优经济制度”，或称“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其实，资产阶级“趋同论”者的上述论调，只不过是一些美丽的骗人的幌子而已。当代资本主义所实行的一些“改革”，在某些环节或某些问题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些局部的调整，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调整，是迫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需要，它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丝毫没有改变资本家阶级剥夺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7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率普遍提高就是明证。

三

资产阶级“趋同论”由于它貌似中庸，并借据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为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澄清和辨析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一曰：“批判资产阶级‘趋同论’，还承不承认两个制度下的社会具有共同性？”我们说“共性”与“趋同”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谓共性，它指的是不同事物的共同性，它存在于个性之中。所谓趋同，它原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亲缘关系较远的异种生物，因所处的生活环境相同，显现相似的特征。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借用它赋予它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相互学习、吸取对方长处、殊途同归，共同趋向“优化社会”的意思。可见，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是两个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形态，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它们分属于高低不同的两个层次。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是比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更高一个层

次的社会形态。一般地说，它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经过历史的发展，尖锐化达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由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团结广大劳动人民，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可见，这两个社会经济形态是代替与被代替的关系，而决不是殊途同归的关系、趋同的关系。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当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也存在某些共同的地方。例如，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物质生产都是该社会存在的基础，它们都存在共有经济规律，都服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两种制度下的商品经济除了固有的特殊性以外，也还存在着一般商品经济的共性等。但所有这一些都不能成为资产阶级“趋同论”的依据。因为决定社会性质的是该社会的本质特征。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是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事实也说明，尽管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形态有着上述共同之处，但并不阻碍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发展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上述各个社会经济形态都有由该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本质特征，由此相互区别。例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它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由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并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形态。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它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不存在人剥削人的制度，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继资本主义社会而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资产阶级“趋同论”者抹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抹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质上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本主义永世长存，其目的无非是拉社会前进

的倒车，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

二曰：“批判资产阶级‘趋同论’，还要不要实行改革开放？”我们认为这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第二个问题。当今世界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搞改革开放，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改革开放有个方向问题。一种改革开放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它是为了改变僵化的体制，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在自身基础上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它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来进行的。通过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自身的巩固和完善。另一种改革开放，却是放弃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被瓦解了，工人阶级的政党丧失了领导权，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趋同了。

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明确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早在1979年3月就向全党明确、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尽管如此，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一些右的干扰，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泛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中心的党中央，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进

一步拨正了方向。因此，我们今天批判资产阶级“趋同论”，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那种企图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趋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反动论调。

可见，我们的改革开放，与资产阶级的“趋同论”有着方向上的根本区别。我们的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坚持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反对搞私有制基础上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反对削弱或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实行经济“私有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反对“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防止和纠正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反对资本主义民主、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坚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精英”政治、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这样，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总之，资产阶级“趋同论”，是地地道道的唯心史观的产物，尽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它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取消社会主义的实质，已越来越被全世界革命人民所认识，革命的无产阶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个锐利武器，坚持通过社会革命，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完成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正明〕

（上接第6页）的新的历史条件。改革同样也是要有章法，要有各种制度、纪律甚至法律来保证的，只不过改革的新的章法是在信息的不断调整过程中形成的，它本身反映改革的需要和精神。

从小生产方式转向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它涉及到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情感、心理等等的转轨，它对社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上述思维方式四个方面的转轨，只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并不是所有的一切。实现思维方式的上述变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企求几个月甚至几年就能完

成。对此，我们宁可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包括知识、教育、文化素质、体制等方面的准备。邓小平指出：“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①思维方式的变革同样也同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同时也与社会的其它方面有关。必须从社会进步的整体过程，来看待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进步，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张正明〕

^①《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104页。